



我和我的电脑朋友背后的故事

□
周健

这次纪念《南通日报》创刊80周年，报社征集报史实物，我在第一时间向报社捐出三台电脑，一台是联想奔2系列台式电脑，一台是IBM公司生产的笔记本电脑，再一台是内存仅有512兆的联想液晶屏座机，都是报社给大家配发的采编工具。从配置上讲，这三台电脑放到现在可以说都是老掉牙的产品，但却记录了我们老报人当年走过的高光历程。我与这三台电脑的关系可以用“无话不说”“推心置腹”来形容，可谓是“知己知彼”的朋友，这其中有许多故事，让我娓娓道来。

信心满满 准备尝鲜

2006年南通日报社第一次给采编人员发笔记本电脑，选了美国IBM公司的产品，在当时来说，这个品牌还是拿得出手的，一些重要新闻发布会上，很多“大记”采访时也都用这款笔记本电脑，看上去还挺有“范儿”的。那年，南通市的友好城市——日本丰桥市建市100周年，邀请国际友城派代表团参加庆典活动。我市决定派出一个大型代表团前往祝贺并进行友好访问。我有幸被总编康贻华特派随团采访。我也就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带上刚发的IBM电脑，准备出国过把“瘾”。这笔记本电脑体积也不算小，重量也不轻，比起我现在使用的华为平板电脑要大了一倍多，但性能要差多了。出发前，我抓紧时间做了一番功课，把报社的网址下载在电脑里，并进行了联网测试。把一周的行程、参团人员名单、市委书记罗一民要到访的几家公司、银行情况，大会贺辞、有可能签订的合作项目等资料搜集在电脑里，并一式两份，其中一套备份留在日报编辑部，以便校核时使用。由于兴奋过度，上车后，发现忘了带网线。在去上海机场路上，正好到上海文峰饭店休息。在那里我借了一根网线。为了避免笔记本电脑在机场行李托运时受损，特地把电脑放进衣服夹层中间。

水土不服 出师不利

日本与中国时差早一小时，到达日本

关于《江海报》的创刊

□ 洪秉奇

《江海报》创刊到今年整整八十年了。

1940年10月，我新四军取得黄桥战斗胜利后，立即挥戈东进，经过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和平谈判，11月间到达当时的通如海启政治中心如皋县掘港镇，在中共南通中心县委（后为苏中四地委）的领导下，接管了国民党江苏省第四行政区督专员公署的政权，从此开始了创建通如海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局面。

同时，中心县委也接管了原四专署主办的《东南晨报》，请江树峰、徐铭延、曹卜仁等三位党外人士，分别担任报社的社长、总编辑和经理，负责报社的领导工作，为了充实业务力量，还调孙大翔、樊发源等青年学生，参加报社的编、采工作。中心县委决定，《东南晨报》的名称暂不改变，仍以四开四版铅印的日报照常出版。但要加强党的领导，力求成为一个宣传我党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的报纸。

1941年春，日寇开始对我通如地区“扫荡”，分区党政领导机关转移掘港近郊，地委驻南胡家园，为了让报纸能正常出版，报社、印刷厂也迁移到掘港西北的王园乡。“8·13”日寇对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后，斗争形势日益恶化，分区党政机关精兵简政，转移到通如边境双墩、二窎一带农村活动，报社也只留部分人员随行，坚持出油印的《东南晨报》。驻南通北兴桥西南的

白龙庙时，为了加强报社的领导，地委派邓炬云同志兼任支部书记，加上原来的孙大翔、章武扬两名党员，建成了报社的第一个支部，并责成我协助支部工作，特别是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樊发源同志就是在这时被确定为发展对象的。

1941年冬，日寇不断对我四分区中心地区大举“扫荡”，地专领导机关东移通东、海启一带活动，《东南晨报》被迫停刊，报社的工作人员也转移到近东六甲、海门东北一带农村。这时，地委来了一批上海北撤的干部和青年学生，地委为了加强报社的领导和业务力量，委派施平同志担任社长（不久即去苏中工作），调凌建华、王舜华、宋军等同志分别担任编辑、记者。由于条件成熟，地委经过多次酝酿，《东南晨报》更名问题，这时就摆上议事日程，最后还是采纳了老报人陈同生同志（当时任苏中第四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的意见，决定更名为《江海报》。原来海启主办的《海启导报》已停刊，就利用他们的印刷力量，出版四开四版铅印的《江海报》二日刊，从此，作为四地委机关报的《江海报》，就在海启诞生了。

此后，《江海报》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特别是在反对日寇“清乡”的尖锐斗争中，就像一面鲜艳的红旗，始终屹立在江淮大地，鼓舞千百万江淮儿女，坚贞不屈，顽强战斗，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直到迎来全国的解放。



上世纪八十年代报社办公地点(钟楼)

“桥头感怀”和“读报日记”

□ 沈玉成

2007年夏，我应江海晚报同仁的邀请，参加“万里长江看大桥”特别报道组，从长江入海口正在建设中的苏通长江大桥工地出发，一直到四川宜宾折回，驱车万里，采访了长江上的一座座各有背景各具特色的大桥、大桥建设者和大桥所在的城市。那时我已年近花甲，给我的任务是每天写一篇六百字左右的评论“桥头感怀”。虽是连夜急就章，但有事先从网络上搜索的大量背景材料，有白天的所见所闻和一路奔波的切身感受，还是觉得很有一点激情和收获的。

我在出发的第一天写的第一篇评论题目是“千年的梦想”。在文章里我写道：“我们要感谢上苍，赐予这块让我们生生不息的崇川福地，赐予这条让我们永饮甘露的浩浩大江。我们要感谢长江，在给我们出了一道世纪难题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一次创造世界的机会。”

以后十余篇的题目分别是：更大的舞台、两岸的风景、大桥的效应、物化的历史、定格的车流、科学的力量、不朽的桥魂、大山的回应、文化的思考、精神的咏叹……到后来搜肠刮肚也想不出什么好的角度，就写了大桥畅想曲之一城市定位篇、之二城市交通篇、之三城市旅游篇。

万里长江行，给了我很多体验和感悟：祖国的大好河山、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劳动的力量和科学的力量；制度的优勢和改革开放的魔力……而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有两次，一次是武汉，一次鄂西。

在武汉，我们采访了中铁大桥局集团后，又一次登上黄鹤楼，眺望横卧在龟蛇两山之间新中国在长江上建成的第一座长江大桥，又一次激动得热泪盈眶。因为在采访中得知，当年担任大桥工程师的彭敏只有35岁。更令人感叹的是，当年在25个设计方案中最终被选中的25号方案的设计者，竟是三个年轻的结构工程师，年长的28岁，其他两人刚刚大学毕业。提及不久前垮塌的佛山九门大桥，中铁大桥局集团的同志嗤之以鼻，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50余年遭遇这样的货船撞击累计有上百次，大桥都安然无恙。强烈的对比和巨大的反差，令在场的所有人都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和反思之中。

在鄂西，我们的车队就一直在大山之间盘旋。一个近在眼前的小镇，需要山上山下绕上好几个大圈子，花上个把小时才能到达。横穿我国东西的大动脉

318国道，在这里就是险象环生的盘山公路。大山里，我们经常看到修筑沪蓉高速的筑路大军。和平原上修筑高速的概念完全不同，这里的高速就是无数座架在大山间的桥和许多隧道的结合。在去湖北恩施的路上，负责后勤工作的张继明的钱包被偷，未追上窃贼，又报案，折腾了几个小时。后又遇上大雨，一路泥泞，连续爆胎，同仁们数次下车推行，直到半夜时分才到达目的地恩施。大家初尝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滋味，也体会到筑路大军的艰辛。

“万里长江看大桥”之行，让我向社会学习了许多，向年轻的同仁学习了许多。后来，我把“桥头感怀”一组评论收进了陕西出版集团出版的我的杂文专著《江苏杂文丛书》“冷眼衷肠”。

2009年初退休后，报社领导邀请我参加新闻研究室组织的每天报纸审读和好稿初评。我一直认为，报纸审读要与办报人有沟通和互动的机会，又因为做了大半辈子的报纸，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从2010年1月1日开始，我每天在电脑上将自己读报的一些感想写下来，发到报社的内网上与大家交流。新闻研究室后来还把我的短文字打印贴在报社内部的评报栏上。日积月累，一年下来也有10万余字，于是就有了报社内部编印的小册子《读报日记》。

其实，每天写的这些话，都是一家之言，本意是想在同仁之间引起讨论，营造一个学习和钻研业务的良好氛围，形成好的学风，建设学习型报社。因此，在出这本小册子时，对一些评点不到位或说错了的地方，也就没有做修改和调整。

感谢报社的领导同意编印这个小册子，更感谢时任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徐仁祥为这本小册子在前面说了一段鼓励的话。徐仁祥在《吆喝（写在前面的话）》中肯定我说的是真心话、内行话，还说“认真的回味咀嚼，认真的举一反三，对于我们提高新闻的引导力、亲和力、公信力，对于我们传媒发生革命性变化、传统媒体面临严重挑战的形势下，守住阵地，扩大阵地，是有益的”。

我在后记里说：“淡泊一生，并无奢望。如果这本小册子能够对建设学习型报社有点用处，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桥头感怀”和“读报日记”，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作为老报人的我，与报社的不解之缘和对报社的眷恋之情。

乘末班车 塔早班车

那些年，手机还不能上网。笔记本电脑可以移动上网，作为一名末班车上的老报人，融媒体时代刚起步，我也算是搭上了早班车。2006年以后，我到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与曾经的报人钱广裕共同主编《江海报》。IBM电脑就成为我移动办公的最好工具。经报社领导和同仁们的推荐，我还兼职崇川区委宣传部顾问，帮助他们创办《崇川在线》，给建筑业协会主编《南通建筑业》，协办《南通邮政报》。同时操作四种不同报刊，进行稿件策划、文字编辑，做图片处理，版面设计，甚至通联工作，没有电脑是万万不能的。退休后，这么大的工作负荷对两台“老机器”来说，显然是不适应了，内存不够，反应速度过慢，常常处于懈怠状态。所好，报社技术部门的“大侠们”服务尤佳，特别是郭庆峰、陶峰随请随到，帮我维护电脑，内存不够了，换内存条，软件没有，就装。

南通大学的老师邀请我去给新闻传媒专业的学生讲采编实践。他们给我的教材我看了，内容还是多年前的老概念。已进入融媒体时代了，排版咋还在讲如何用画版纸……于是我自编了一套电脑排版的速度讲稿，以实版为例从报头设计、制题到稿件选择、版面安排、字体选择到广告进行逐一讲解。电脑排版需要专门软件，陶峰帮我在笔记本电脑里装上了软件。有了他们作后盾，我也就平添了几份底气。我将自己搜集到的数百张有关报史和新闻采编活动的图片一一投射到大屏上。师生们看到如此鲜活的一幕，顿时活跃起来，每堂课都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报社迁进新大楼后，我终于不再劳累了。我的IBM笔记本电脑、联想奔2和至今仍放在报社老干部活动室的那台联想座机渐渐地再也打不开了，他们的“新闻生涯”也从此告一段落，带着我和他们的故事留在了南通日报创刊八十周年的记忆中。